

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

(上接3版)

在宁波镇海,一座党纪馆——威远清风馆,成为党员干部的“法治课堂”。该馆于2015年在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基础上改造建成,11年来,每年吸引近400个团队、2万余人次来此学习参观,党员干部们在这里真切感受到纪律红线、法律底线的不可逾越。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全民守法的希望所在。“八五”普法期间,省司法厅会同省教育厅开展“法育青蓝”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宪法晨读、法治成人礼、模

拟法庭……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让法治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去年暑假,杭州市上城区联合浙法传媒“法姐姐”公益服务队,在防空洞里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法治游园活动。孩子们在26℃的清凉中,走进“一五”普法到“八五”普法变迁的时光隧道,在观影区看获奖的法治微电影,在运动区用沙包击打写有“邪教洗脑”“网络成瘾”的标靶,玩得不亦乐乎。一位参与游园的小朋友兴奋地说:“我玩了一上午,把好多法治知识点都记下来了!”

既要守护好青少年心中的法治种子,也

要守护好企业家的法治信心。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尤其重视民营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普法工作。省司法厅会同省人社保厅广泛开展“开工第一课”普法活动,累计开展现场讲课、线上直播等活动14万余场,服务企业从业人员580余万人次。

在台州,全国首推的“守法惠”系列服务,通过“守法贷”累计为企业发放贷款115亿元;编印的《民营企业涉外依法经营手册》,发布涉外法治宣传典型案例146个,助力提高涉外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意识。

精准普法:从“端菜”到“点菜”的转型

普法的对象千差万别,普法的需求各不相同。法治宣传如何避免“大水漫灌”?浙江的答案是:精准普法。

201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重点单位普法责任制”;2021年,省政府出台《浙江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规定》;2023年,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出台《浙江省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年度履职评议办法》。从“谁执法谁普法”到“谁服务谁普法”,浙江的普法责任体系日益完善。

202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浙江以法治宣传教育法实施为重要契机,优化完善大普法格局,持续推动普法工作从“软任务”迈向“硬约束”。

“八五”普法期间,浙江省被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确定为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唯一省域试点,印发《深化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实施方案》,指导各地各部门编制公民法治素养基准92个,建成省市县三级公民法治素养观测点1019个,广泛覆盖包括新业态从业者在内的各类群体。

在基层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各具特色的精准普法路径。

2010年7月,临安网民陈燕发帖称邻居建房越界、村干部偏袒,其父被刑拘。帖子引发2000余名网友一边倒“声援”。临安市公安局(现临安区公安分局)组织“相约派出所”活动,邀请网民、案件当事人、村干部、执法监督员公开辩论,让各方摆出事实、充分交锋。这是全国首例网民“断”案,开启网络问政新形式。

宁波的一场“杀猪宴”,同样成为精准普法的生动案例。今年2月初,慈溪一家农场主张某在直播间发出邀约:“明天来我农场,杀年猪、吃宴席,400个名额,手慢无!”慈溪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发现,用于宴请的两头生猪系无检疫证明宰杀。对此,检察院立即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磋商程序,邀请有关职能部门共寻解决方案。最终,一场“杀猪宴”走上规范之路。当监管前置在风险发生之前,守法便成了守护人间烟火的最优选。

“十几年前,我去海岛渔村讲老年人权益

保护,一位老渔民反过来给我‘上了一课’。我刚用普通话开讲,他就对我说‘我们要听土话’。”舟山市普陀区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王佳琳笑着回忆,“这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法治工作的一线,也一直记得老渔民教给我的道理。给孩子普法,我们搞研学;给年轻人普法,我们开发法治剧本杀和文创周边。普法不是我想讲什么,而是群众需要什么。”

“八五”普法期间,针对海岛分散痛点,舟山市全岛链构建“船、站、点”立体普法网,创新“伴船式”“预约式”海上法律服务机制,开展“小小航海家”等沉浸式普法活动,推动普法与法律服务直达航程、覆盖岛际,成为海上普法的创新范例。

普法方式的变革,折射的是对“人”的尊重,对百姓“需求”的回应。当普法从“我想讲什么”转向“群众需要什么”,法治便不再是悬在空中的概念,而是融入日常的活水。精准普法的最终归宿,正是让法治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土壤。

扎根基层:法治乡村与公共法律服务

深入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是浙江全民守法的重要基石。

2019年6月,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在宁海县举行;2020年11月,全国首部乡村法治建设地方性法规《湖州市法治乡村建设条例》施行;2025年11月,《金华市“后陈经验”传承发展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村务监督等制度予以固化;在安吉县余村村,当年的“两山”理念诞生地,如今已成为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

目前,全省共培育“法律明白人”20余万名,实现每个行政村5名以上“法律明白人”全覆盖。“八五”普法期间,浙江3次承办全国“法律明白人”培训班,推动浙江经验走向全国。

在杭州余杭,闲林司法所原副所长贾国华的家中,整齐码放着125本工作笔记,纸页泛黄,字迹密密麻麻,记录的是20多年来基层矛盾纠纷的处理经过。2006年一桩水池意外死亡纠纷的调解记录中,他写道:“法治不是吵赢谁,而是让人知道结果在哪。”从“靠经验”到“讲程序”,从个人应对到制度运

行,这125本笔记见证了基层治理的深刻变迁。闲林司法所现任所长支旭兰2008年参加工作,她感慨道:“我刚工作时,就已经在创建省级民主法治村。如今,多元化解机制逐步形成,普法宣传、网格排查成为日常,基层治理网络不断织密。”

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建成“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实体服务平台2.18万个,2025年累计提供法律咨询85.9万件,办理法律业务173.8万件,服务群众满意率持续保持在98.5%的高位,精准呼应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需求脉动。

“我们在东海之滨守护着743.5个岛屿,38万岛民……”今年2月9日下午,司法部党组以视频方式亲切慰问基层一线司法行政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屏幕那头传来清晰又充满力量的声音。

舟山市普陀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俞英超作为全国5名基层代表之一,面向司法部领导,汇报了来自海岛法治一线的坚守与收获。

短短3分钟的连线,浓缩的是一位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十四载的坚守。视频连线时,俞英超用平实却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海上枫桥”新画卷。“我和我的同事们,驻守渔船码头,服务渔民群众。我们在候船厅、公园、夜市设立的26个‘24小时法超市’,在码头、客船设置的215个服务点,让群众15分钟内就能触达法律服务。”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法律援助中心调研时,留下了谆谆嘱托。

20多年来,安吉的法律援助工作一步一个脚印——

在湖州首创推行法律援助“双选制”和“点援制”,援助律师经考核“入库”,受援群众可以自主选择心仪律师;

在浙江首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审查办法”,为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提供了便捷;

在全省率先推行援助案件“差别化”补贴制,按照受援人、法官、律师分别评分,建立量化评价体系,依据考评得分给予差别补贴; (下转5版)